



汪向荣著

古代的 中国与日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汪向荣著

古代的中国与日本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秦入路

封面设计：宁成春

古代的中国与日本

GUDAI DE ZHONGGUO YU RIBEN

汪向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41,000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5.10元

ISBN7-108-00265-5/K·29

前 言

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包括某些懂得历史的,主张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当然,中国和日本,都使用汉字,在一百年左右以前,很大一部分日本人也能用汉文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中国人和日本人又是肤色相同,风俗、习惯也相似,而且历史上也确然有过中国移民到达日本列岛之后,不再归回本土而成为日本人的事实。尽管这样,我对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说法,始终认为是需要商榷的;即使在四五十年以前,这个口号叫得最响、传布得最广的时候,我也没有表示过同意。

不能否认,直到明治初期,汉字、汉文在日本流通的范围很广,一般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认识汉字、不通汉文的。但是,当时汉字、汉文流通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日本而已,最少,当时的朝鲜和安南(现在的越南)也通用汉字和汉文;有的,在程度上更高于日本。如果说中国和日本是同文,那么为什么不说中国和朝鲜、安南也是同文呢?我认为,汉字、汉文的传播、流通并不能认为就是同文的证据。同文,除了这些有形的文字相同以外,至少在思想方法上也应该是一致、相同的。当然,儒教思想曾影响过日本,也影响过朝鲜和安南;对这些国家有影响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已经中国化的佛教,而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

区别必须注意，这一点应该说是决定是不是同文的主要关键，就是中国和其他汉字文化圈的民族、国家，因为所处的地理、历史环境不同，所以对事物的思维方法、考虑方式并不一样；或者说，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决不相同。适用于中国的，并不能通用于日本、朝鲜或其他受汉文化影响的民族、国家，有时甚至相距很远，或完全相反。每一个民族都生长在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中，养成了这一民族自己的思维方法和判断标准，决不会和其他民族相同。汉字和汉文，不过是用来表达这种思维、判断的工具。因此，决不能因为表达工具的相同或相似，而就目为同文。何况，在汉字文化圈，或者说受汉文化影响的地区中，所用的汉字、汉文也不完全相同于中国。所以我认为，称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同文，是需要认真商榷的，还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而已。

至于同种，那更明显容易判断。大和民族并不是一个单纯人种的民族，从历史上知道，这个民族经过多次的混杂、融合。参加这个民族混杂、融合的有汉人、蒙古人等属于中华民族的人种，也有马来人等不属于中华民族的人种；而且这些不同的人种在混杂、融合以后，又生长在日本列岛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混杂、融合前原有民族人种的大和民族。大和民族以后又不断吸收、融合来到日本列岛上的其他民族，形成和演化成今天的日本人。当然，大陆上的汉族或其他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也陆续在演变和融合其他民族而形成一个新的人种，尽管其演变程度要远逊于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民族。但两个民族之间无法目为同种，则是件极明显的事实。

当然，我主张中日两大民族间同文同种的提法需要商榷，不能贸然提出；并不是否认中日两国、两大民族之间没有关系——在人种和思想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字上有很深的联系，这是历史事实，客

观的存在,谁也不能否认。我认为这些历史上的紧密关系和同文同种的提法,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不能也不容混淆。”半个世纪前,出于政治的目的,这样提还有它自己的逻辑,今天再重提这样一个口号,尤其是出于某些学者之口,就未免有些令人费解了。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说我太武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同样的资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我决不把我的意见强加于人,但在没有足够的资料或事实说服我以前,我也不想改变我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是经过长期考虑、修改而形成,决不是简单产生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在中日关系史方面曾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修改我的想法,以后当然还要探索,还要修改,但从不是在没有根据或根据不足的情况下修正。这次把我四十多年来的成果,汇集成册而加发表,其目的就是想就教于高明。尽管其中有少部分,过去曾用中日两国文字发表在两国刊物中,得到中日两国和美国朋友们的指教,我还采纳了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正,但毕竟只是文章的片断。现在我把这些方面文章集中在一起,或许更便于征求意见。

在就正于大家之前,有些情况需要说明一下:

这里收集的,是我年轻时代到现在为止所写、所发表的有关中日关系史中古代部分的文章,从时间的跨度说,几达半个世纪,从写作的条件说,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从年轻时候起,选择了研究中日关系史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多少年来,为了这一目的,我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在中日友好高唱入云的时候,在两国关系极度险恶的时候,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念。我的研究,决没有,也不会因局势的变动而改变;也有过某些好心的人,在我境遇十分困难的时候劝过我,只要对某些观点、结论作若干的修改,我个人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我对这种关怀虽然十分感激,但

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初衷。我觉得这样做，有违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本旨。因此，我的大半生一直处在坎坷之中，被人目为不合时宜的人。正是这样，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坚持了过来。除了客观上不容我读书的几年以外，没有中辍过我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我记得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过，因为我把两国关系史的研讨工作作为我终身的事业，所以只要有分秒的时间，毫厘的收益也必用之于此。这些话决不有所夸张，相信知道我的友人必能为我证明。近十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过去藏诸篋底、敝帚自珍的东西也能公诸社会了。这里所集录的，有一部分就是近十年来发表的文章或讲话的底稿，其中贯穿着我对中日关系史的看法和立场。由内容论，涉及范围是较窄的，因为其他方面我没有探讨过。

●关于邪马台国的文字，这里收录了两篇，一篇是在国内发表过的；另一篇《再论生产力和邪马台国》一文，则没有在国内发表过，而是应日本一份历史杂志之约而写的。这里有必要再说明一下：

1982年我对《魏志·倭人传》的意见，用文字方式发表以后（口头的报告，则是在1979年由北京大学发表的），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的史学界给予了很大的重视，甚而说：“中国学者发表对《魏志·倭人传》的意见，使邪马台国的论争，超越了国界。”并且也见到了一些曲解我原意的文章。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有关邪马台国论争的意图，而且我对《魏志·倭人传》的看法和所根据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我在彼邦留学时所知道的，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因不可能接触到新资料而感到遗憾，所以在大约三年的时间中，我虽然拜读了绝大多数国内外对我撰写的有关《魏志·倭人传》意见的文字，却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出任何反应，因而可能使人产生一些错

觉。为了阐明我的立场和观点，避免以讹相讹，我在1984和1985年曾向日本朋友们发表过讲话和文章，其中就有这篇应约而写的文章。当时没有在国内发表，则是因为撰写的对象主要是日本朋友们。这次把它译成中文收集在这里，是想让我国的朋友和读者们知道我在研究邪马台国问题上的观点和方法，并不是想参加论争。因为我认为，了解《魏志·倭人传》所述时代的日本列岛上的种种情况，比知道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对于一个研究中日关系史或日本古代史的人来说，要重要得多；当然，邪马台国在哪里，也是有研究必要的，可是，见仁见智，何必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加诸他人呢？

上面说过，这些集录的文章，有些是我四十多年前写的，有的是近十年来写的。这次收集时，除了改正个别文字和印刷上的错讹外，不作其他修改。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使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我当时的水平和观点，便于和今天相比较。当然，从今天看来，不仅某些文字需加修润，而且有些观点也是十分幼稚，值得商榷，或者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有一点，我想读者们一定可以从中察觉到，这四十多年来，我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没有很大的改变，水平也提高不多。对我来说，实在是件汗颜的事，我浪费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尽管没有中辍我的研究，可三十多年没有机会把我所想的、所写的就教于国内外学术界。一个人埋头能有什么进步？虽然说，形成这种空白有其客观的原因，但对我自己来说，仍是件不可原谅的事。不过，我还是有信心，跟随大家后面，共同前进以弥补这段损失的，特别是在国家政策日益开放的今天。

回首往事是没有用的，只有努力向前，才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尽管我年近古稀，精力日衰，但失去的总是要补回来的。这次

把我研究成果中的古代部分集录出版，就想作为一个个人的里程碑，对过去的加以总结，以准备新的起步。从这一意义上，更希望国内外的朋友们、读者们多加指教，俾在以后的征途中少走些弯路。

汪 向 荣

1987 年 11 月

目 录

前 言 (1) .

中国文化圈 (1)

先史时期日本的中国移民 (26)

徐福到了日本吗? (64)

古代中日关系的新发现 (107)

——大泉五十钱的出土

由生产力论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 (124)

再论生产力和邪马台国 (157)

大化革新和中国 (173)

中日间的第一次战争 (203)

邀请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 (212)

鉴真在日本佛教史中的作用 (227)

渤海国和日本 (254)

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310)

中国文化圈

从同文同种谈起

过去，一谈到中日两国间关系的时候，总爱说同文同种；现在虽然还有人这样说，但不多了。其实，这样提是很值得商榷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中国和日本之间，是有许多相似相类之处，但并不存在同文同种的事。

同种，应该说两国共属于一个民族；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日本呢，虽然也有些少数民族，但基本上却是单一民族。在日本民族的构成中，确不断有其他民族，特别是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移民，定居日本列岛，归化并逐步形成日本民族一分子的，人数或也不少，但从整个日本民族说，还只是极小的部分，不足以改变日本民族的构成；而且，他们在归化以后，逐渐的被土著民族所融合吸收。他们的归化，推进或改变了日本民族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原样地保留其原民族的所有特点，反而成了日本民族的新血液。因此，怎么能说日本的大和民族和中国的汉族或其他民族是同种呢？当然，在日本民族的构成中，曾有过汉族或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成分，正如在中国各民族的构成中，也有过大和民族血液的混入。

至于说同文，一般都认为日本长期以来都使用汉字、汉文，和中国相同，应该说是同文了。的确，日本今天虽然已尽可能用假名，还保存的汉字、汉文不多了，不过仍到处可见。这种汉字、汉文的痕迹，大概再过几个世纪，也不会完全消灭的。那么中日两国是不是同文呢？为什么又说两国不同文呢？

日本长期以来，直到今天还使用汉字、汉文，固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日本所使用的汉字、汉文就是中国所使用的吗？仔细的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中国和日本，虽然同样用汉字、汉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可并不相同；即使在汉字汉文初传到日本列岛的时候，也不完全一样。日本式的汉字、汉文，在中国人来看，不一定能懂；至少，不像对中国式汉字、汉文那样易于理解；有的，竟可以说是完全不懂。而且，某些汉字、汉语，虽文字完全相同，可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含义，却又不同，或者是截然相反的。

举些例吧，现在我们在日本所用的汉字中，有一些字是我们一般中国人所不认识的，像：辻、辻、込、畠、井、夙等等，这都是用汉字的形式出现的。词，也这样，像张合（奏效、竞争心）、张本人（罪魁、首谋）、弱味嘈（懦夫）、新米（生手）、思召（你的意见）等，也不是普通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有的更是莫明其妙，百思不得其解的，如日语中的“张目”，是汉语中“接口”的意思，“怪我”作“受伤”和“过失”解；还有的在汉语词下面，加一个动词的变化，意义正相反了。这些都是般中国人所不理解，也想不到的。能说这是同文吗？

当然，不能单看汉字和词，因为要把汉字组成文以后，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那么看看日本人用的或写的汉文吧！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几乎都用汉文来表达他们意思的，甚至官方文件，也都使用汉文。但是这些汉文是经过日本人改造过了的汉文，所以中国人（指一般的，而不是通日文日语的）看不懂。例如

庆长十四年(1609, 明万历三十七年)萨摩藩主岛津义弘和江户政权首领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间, 为岛津侵略琉球成功一事来往文件的原文是这样的:

急度申入候。琉球之仪无残所属手里候由到来候。诚大庆不过之候。右之样子从陆奥守以早打申上候付, 传书如此候。然者从倅家他国江防战取挂候事, 此度始之样候处, 宜仕合。毕竟忝被加上意, 然御威光播面目候。此等高段, 寄寄可然样御取合祈候。犹委曲陆奥守可申入候间, 不能书载候, 恐恐。

五月二十六日

惟 新

琉球之仪, 早速属平均之由注进候, 手柄之段被思食候, 则彼国进之候条, 弥仕置等可被申付候也。

七月七日

家 康(墨印)①

这两文件, 虽说完全是用汉字写成, 但一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它和中国的汉文, 不论在行文的风格、程序等方面, 迥不相同。

或许说, 日本在中世纪后, 汉文有了变化, 所以难懂; 可是在古代, 尤其是唐化最盛的天平奈良时代, 那时的日本, 完全用的是和

① 这两段文字的现代语译如下:

“急报, 顷接琉球已全部得手之报, 诚堪庆贺。详情将由陆奥守飞报, 兹特奉闻。小儿之与他处作战, 以此为首, 竟能一举告捷, 诚属幸运, 亦托庇君侯之威信。特此上报, 敬请便中代为呈报。至具体情况, 当由陆奥守直接详陈, 不赘。

岛津义弘(惟新)”

“关于琉球之事, 得报悉已迅予占领平定, 至为庆幸; 助功伟绩, 实深嘉慰。兹将诸地赐予贵藩, 着即便宜从事。此复。

德川家康(印)”

文中的惟新(岛津义弘)是当时的萨摩藩主; 陆奥守是指其子岛津家久。此往来文件是江户政权承认萨摩藩占领琉球的文书。前文是岛津义弘给骏河守山口直友、上野守本田正纯的。

中国一样的汉文，就易懂。事情的确如此，日本开始大量吸取中国先进文化时，所作的汉文，比起以后就易为中国人所理解，但它也并不完全跟中国人所作的汉文一样，先不说用汉字作为音标的，就以纯粹的汉文而言，也是有区别的。以大化革新的诏书为例：

（大化）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贺正礼毕，即宣改新之诏。曰：其一日，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仍赐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降以布帛赐官人、百姓有差。又曰，大夫所使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

这样的例很多，在《日本书纪》等六国史上俯拾皆是。也就是说，从汉字汉文传入日本开始，日本人就根据其本国的需要加以改造，使其成为适应于日本这一特殊环境、社会结构的文字，而并不照搬。就是说，把中国先进文明中用来表现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文字，作为工具，成为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工具，因为这样，其和中国的不同，自属理所当然。两国的不同文，也是很清楚的事。尽管这样，还不能不承认，日本的文化是源出中国的，因此，从形式上看，中日两国“同文”之处是不少的，但这个“同文”，和同文同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只能认为是过去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所留下来的痕迹、标志。

中 国 文 化 圈

因为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有这样广而深的关系，所以“同文”之处千头万绪，随时随地都能见到。中日虽不同文同种，但过去日本在吸收文明上之受益于中国，属于中国文化圈，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历史上说,中国文化圈这一个事实是存在的,其影响所及,不仅有日本,且亦及于朝鲜和越南。当然,中国文化圈的存在和范围,和中国过去的国力有重要关系,但主要的,是在于中国的先进文明(包括生产知识在内)。因为这样,一直到今天,尽管中国的国力已不如文化圈内一些国家,但仍不能不承认这些国家曾受过中国先进文明的影响,是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一员。日本,虽然在现在无论从科学文化上,或是经济生产上都远超中国,但仍称中国是其文化母国,依然珍视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整个世界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征、中心,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平衡,每一地区中文化水平和生产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形成这个地区的中心,影响本地区中一些生产力落后、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吸附在其周围,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文化圈。以亚洲而论,在古代和中世,就有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的存在。两个文化圈以喜马拉雅山相隔,彼此影响其周围的国家,一直到公元前一百二十六年张骞从大月氏(zhī)国回到中国之后,才见到两个文化圈间有互相交流的事:佛教开始通过丝绸之路这一条贸易通道,向中国传入。不过印度文化圈的影响,还没有波及到东亚其他国家;而东亚国家,从越南到朝鲜这一个半圆形地区中的民族、国家,一直到十九世纪欧西文化大量输入到东亚之前,始终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的。

可以大概的观察一下,在东亚地区中,南起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北至朝鲜半岛,中间包括日本和琉球,在十九世纪以前,无论是政治结构、生产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是以中国为其范本的。当然各地区有其独特的环境、条件,他们的文化是在他们这种环境、条件下成长、发展的,不会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翻版,不能还原为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说,不能把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文化,简单

地视作中国文化的部分。但是,若从其中排除中国文化,虽不能说其没有文化,却是无从理解它的发展情况的,尤其是在思想意识方面。

代表中国文化的是汉字和儒教思想。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经过中国的吸收、消化改变成中国式的佛教以后,也和儒教思想相混,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环,在思想意识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政治制度方面,在隋唐之际完成的律令体制,也就是在隋唐时代总结秦汉以后长期实践而成的法律体系,和建筑在这种体系上的统治体制、机构,这些都形成了中国文化圈的特征,也成为周围文化水平低、生产力弱的一些农耕、游牧民族、国家在吸收中国先进文明同时输入的主要内容。这些特征,都可以在纳入中国文化圈的一系列国家、民族中见到;尽管都以各自的民族形式表现,但追溯其本源,则来自中国。

尽管现在中国的国力不强,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比较落后,有些国家不再承认过去曾经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或者不承认曾经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甚而说中国的文化曾经受过他们的启迪和影响,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文化圈。这当然是徒劳的,任何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是不会作这样想法的。

从几个特征,看一下中国文化圈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对周围当时远比中国落后的民族、国家有过影响,和他们过去的文化是不是源自中国,这些是很必要的。

汉字和汉文

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圈,最明显的标志是汉字和汉文,一直到现在,这个文化圈内的各民族、国家,都可以见到有汉字存在的痕

迹。虽然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都限制汉字的使用,改用本民族文字或罗马字拼音,可是汉字还没有完全被摒弃、绝迹。这明白的告诉人们,他们是曾经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

汉字是一种工具,表达完整的意思是要用由这种汉字组合而成的汉文。在古代和中世纪,因为中国的文化水平、生产水平远超周围各民族、国家,因此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面,汉字和汉文是唯一通用的国际文字;一直到这些民族、国家,在汉字、汉文的影响下,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以后,这情况仍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以汉字、汉文来作为中国文化圈的标志,是很恰当的。

汉字和汉文的开始在中国周围的民族、国家中出现,其时间很早;至于怎样传去的,恐怕是和移民有关,当然以后是由于国力远及这种地区,他们和中国的交往中,必须应用汉字、汉文所致。从现在所知道的历史看,汉字、汉文外传到中国文化圈中一些民族、国家,是分两条道路的。一条是先传到朝鲜半岛,再经朝鲜半岛上一些国家传入日本列岛的;因此,日本列岛上的有汉字、汉文,在时间上应晚于朝鲜半岛上一些民族和国家。另一条是由不同的途径传到越南的,不过汉字汉文传到越南以后,并没有像朝鲜半岛那样再外传;这可能是由于那些地方的文化和生产水平,跟中国的先进文明之间相距太远,以及印度文化圈的文明也从另一方面加以影响的关系。

朝鲜半岛和中国发生关系,最早有大批移民到那里,当在殷商时代,即传说中的箕子时代。箕氏朝鲜时,中国的移民中究竟是不是有人将汉字、汉文带去,还很难证明。不过到卫氏朝鲜时,就显然有汉字、汉文的影响可见了;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侵略朝鲜,在朝鲜半岛上设置四郡,直辖中央之后,中国文化大量的进入